

「禮學專題」序

彭 林

自殷周鼎革，周公制禮作樂，禮治便成為中華文明之底色，兩千年皆然。

孔子以仁為最高道德，而以禮為歸仁之唯一途徑，「一日克己復禮，天下歸仁焉」。（《顏淵》）孔子以禮樂為修身之最高境界，子路問成人（即「完人」），子曰：「若臧武仲之知，公綽之不欲，卞莊子之勇，冉求之藝，文之以禮樂，亦可以為成人矣。」（《憲問》）以一人之身而兼有知、不欲（廉）、勇、藝，尚不足為成人，而必於其上再有「禮樂」一項，方得為完人。故孔子又云：「興於《詩》，立于禮，成於樂。」（《泰伯》）禮樂為儒學之核心，於此可見。

孟子「四端」之說，禮居其一，云不知禮者「非人也」。又將禮義譬為門徑：「夫義，路也；禮，門也。惟君子能由是路，出入是門也。」（《萬章下》）誰能出不由門，行不由徑？又以禮為君子長存于心者：「君子所以異於人者，以其存心也。君子以仁存心，以禮存心。」（《離婁下》）禮可須臾或離乎？

荀子隆禮重法，云：「禮者，人道之極也。然而不法禮，不足禮，謂之無方之民；法禮，足禮，謂之有方之士。」（《禮論》）又云：「天地者，生之始也；禮義者，治之始也；君子者，禮義之始也。」（《王制》）又云：「禮者，治辨之極也，強固之本也，威行之道也，功名之總也，王公由之所以得天下也，不由所以隕社稷也。」（《議兵》）

兩漢以下諸儒，多秉持孔孟禮說。太史公《史記》「八書」，以《禮書》《樂書》為首。《漢書·禮樂志》則云：「六經之道同歸，而禮樂之用為急。治身者斯須忘禮，則暴慢入之矣；為國者一朝失禮，則荒亂及之矣。」

司馬光《資治通鑑》以禮論史，故開卷便云：「天子之職，莫重於禮。」歐陽修《新唐書·禮志》臧否三代以上與三代以下之治，一以禮為尺寸權衡。曾國藩篤信儒家「以禮自治，以禮治人」之道，稱「修身、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，則一秉禮乎禮」，「舍禮無所謂道德，舍禮無所謂政事」。

西學東漸之後，學術錯綜，梁啟超以「禮治」與「法治」區分東西文化，錢賓四深以為然，云：「梁任公以中國重禮治與西方重法治相對，此可謂深得文化分別之大旨所在。」（《中國知識份子》）錢先生又云：禮「是整個中國人世界裡一切習俗行為的準則，標誌著中國的特殊性。」與西方人所謂「文化」約略相當，因此，「要瞭解中國文化，必須站到更高來看到中國之心。中國的核心思想就是禮」（《錢穆的七房橋世界》）。

「五四」運動以打倒禮教為反孔之核心，「文革」之「批林批孔」運動，亦以「克己復禮」為孔子最大罪名。此正適足可見禮為儒家文化之核心。然近百年來，傳統學術屢遭顛覆，數典忘祖，以至學界亦多有不知禮為何物者。禮學不振，傳統學術何以中興再盛？

2013年春季學期，在下應臺灣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系之邀，前往做客座教授，系內陳韻教授長年從事三禮之學，故彼此多有共同語言。某日，陳教授告知，中文系擬舉辦「禮學工作坊」，遍邀禮學名家來校作圓桌對談；《中正漢學研究》為核心期刊，屆時亦將與之配合，徵集兩岸三地學者之名家大作，希冀以此推動禮學研究。5月22日，禮學名宿葉國良、林慶彰、李豐楙、楊儒賓、莊雅州、徐福田等先生不辭辛勞，由四方匯聚中正大學，發表宏論，並就彼此關心之禮學問題，展開討論。在下恭逢盛會，與有榮焉。系主任賴錫三教授親自主持大會，氣氛熱烈，前來旁聽之校內外學生亦不在少數，今《中正漢學研究》編輯部將所徵求之葉國良、單周堯、虞萬里、李豐楙、橋本秀美諸先生之鴻篇大作，與圓桌討論之文字整理稿，以「禮學專號」之形式一併刊發，堪稱禮學研究之盛舉。鑒於在下為此一過程之親歷者，故編輯部命序于余。在下固辭而不獲，遂略綴數語而識此事，誠望各地大方之家、盛名之刊於此窺見中正大學推動禮學之苦心，日後若能有所呼應，則禮學幸甚。

彭林識於清華大學荷清苑寓所

甲午年處暑後三日